

国之重器曾来潍坊又离开潍坊

——小记毛公鼎颠沛流离的流转历程

□张漱耳

毛公鼎的发现

时光倒回距今182年前,时为大清道光二十三年(1843)。在炎帝生息、周室肇基之地的陕西省岐山县,董家村的农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掘地时,意外挖出一个深埋地下数千年的青铜鼎,估摸有百十来斤。你一定猜出,就是毛公鼎。没错,董春生再不懂,也被它内壁那么多的文字惊呆了。当地的一个古董商闻讯赶来,很快一拍即合,古董商出白银300两购藏。清朝的白银要结合不同时期的购买力换算,一两折合人民币约在150元至450元之间。道光时期的200两购一处北京四合院是绰绰有余的。可见,毛公鼎出土后的首次交易就价格不菲。

就在古董商运鼎走到村南时,有董春生的邻居董治官父子站出来阻挡。父子认为,铜鼎是在与他们相邻的地里挖出的,他们当然也得有份儿,拦着不让古董商运走。阻拦争吵中,父子还把古董商人打了一顿,夺下了宝鼎。

古董商气愤不过,找到知县重金行贿。知县将董治官以私藏国宝治罪,逮捕入狱,毛公鼎暂被运到县里,旋即被古董商运走。

这之后的几年,毛公鼎处于沉寂状态,古董商不知将它卖给了何人。其间,清朝书法家、篆刻家丁敬门徒张燕昌之子,也是金石学家的张石瓢自称见过毛公鼎,其外在形态和内部铭文表述充分,张石瓢断定为商周时期青铜鼎。但他没有说明何时何地见到的毛公鼎。依据其父也是著名收藏家,估计不是在他本家,也是在与之关系密切的另外藏家那里。

陈介祺的收藏与研究

十年后,进入咸丰年间,毛公鼎终于二次露面时,已辗转落入北京古董商苏亿年之手。苏亿年与弟弟苏兆年是西安人,在京城琉璃厂经营着古玩铺子永和斋。

苏亿年得了毛公鼎,想的就是转卖赚大钱。那时上古三代的青铜器就不是以质以斤论价,而是按字数算钱,一字可售“数金乃至数十金”。鼎内密密麻麻的文字,苏亿年数了密,整整497个。他深信奇货可居,售价可观。

交易时,苏亿年可能模糊了他的来源。因为《陕西金石志》这样记载:“由烂铜铺在乡间收买,运省备熔化,为苏亿年瞥见,以市钱六十千购得之,运京出售,稀世之宝,乃得流传”。市钱六十千,合人民币六万元。呵呵,宝鼎越卖越贱了?《陕西金石志》这个记载存疑,不足采信,所记当是苏亿年讲的故事而已。

时金石学家、收藏家陈介祺在京做官多年,任翰林院编修、国史馆协修等,涉猎多种历史文化典籍,精通经史、训诂、音韵,尤嗜

今年6月,潍坊举办了一场“礼敬簠簋薪传国粹”北京活动周学术交流会,会上展示了毛公鼎全形拓。簠簋为清代潍县大收藏家陈介祺的名号,而毛公鼎曾是陈介祺的顶级收藏,因此也成为潍坊人心中难以割舍的记挂。当年它究竟怎样流入,又是如何流出的潍县?因为经历的历史浮尘甚多,很多人未必了解,今天就来追述一下。



国宝毛公鼎,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

毛公鼎全形拓。

爱金石、古印。累积的藏品,大都放置于道光年间在老家潍县建造的“万印楼”。他与琉璃厂永和斋苏氏兄弟早就相识并有交集。购得毛公鼎之前,陈就先从苏兆年手中买了与毛公鼎同时出土的青铜器聃簠(今称大丰簠、天亡簠)。陈介祺《聃簠释说》所记有语:“与毛公鼎同出关中”“余得是器于关中苏兆年”。

毛公鼎是陈介祺于咸丰二年(1852)花费白银1000两,从苏亿年手里购得。文物考藏专家鲍康在他的《观古阁续丛稽》中有明确记载。

陈介祺得鼎后,鉴于清代秦汉以上文物不得私藏之规定,为避免法律纠纷与政治风险,秘密将毛公鼎运回原籍,深锁密藏于簠斋,绝不示人。其他彝鼎铭文,陈介祺乐于与人共享,唯毛公鼎例外。

两年后,他惦记毛公鼎,加上不满朝廷丧权辱国,借口处理母亲丧事返回潍县,从此不再复出为官,一心专注文物考证和金石研究。

他在家与拓工密制毛公鼎拓片,运用自己所学,弄明白了这件因作者毛公命名的青铜重器铭文的释义。清同治年间,陈介祺完成了《毛公鼎考释》定稿。497个文字,记载了周宣王为中兴周室,要重臣毛公忠心辅佐,并赐给他大量物品,毛公为感谢周王,特铸鼎记事的史实。

铭文以成熟的西周金文镌刻,结构匀称,线条遒劲。文辞典雅,叙事完整,后有郭沫若“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风烈”“抵得上一篇《尚书》”之赞。

当年陈介祺亲自指导督制的毛公鼎全形拓,注重细节呈现,强调鼎的造型特征与铭文线条的精

准复制。王国维有“惟陈氏拓最精”评语。目前存世极少,一般为翻刻本,真本价达千万元级别。

陈介祺深谙藏家不过三代规律,力图打破这一魔咒,制定了三条家训要求后人:一不做官,二不经商,三与僧道无缘。在光绪十年(1884)弥留之际,再次遗言叮嘱儿孙:谨遵家训,安心学问,保住家藏。

陈氏后人卖予端方

然而,时势的急剧变化,潍县陈家这个封建大家族走向了分崩离析。他们把家业分成三份,毛公鼎归了二儿子陈厚滋。到了第三代,陈氏后人违背组训,以两万两银价将毛公鼎卖给了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。从此毛公鼎流出潍坊,一去不复返。

1911年10月,端方在川汉铁路大臣任上,带湖北新军入川抵制保路运动,致使武汉空虚,辛亥革命成功。端方进退维谷,许诺分两次出四万银两,请部下标兵队保护逃往西安府,欲据甘肃为都督,或者回家。不料出发之际,标兵队担心到达后付银两不能兑现,遂决定起义,杀掉了端方。

端方死后,家藏的毛公鼎被其小妾质押给了俄国人在天津开办的道胜银行。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向端家购买,端家嫌钱少,不肯割爱。

到了1926年,有个美国人准备出重金购买。消息传出,国内舆论哗然,认为中国的宝鼎不能落入外国人手中,敦促国内有识之士抢先买下。时任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的收藏家、书法家叶恭绰,变卖部分藏品,东拼西凑了三万银元,将毛公鼎从俄国银行

赎回。自此宝鼎又归叶家,改存于北京大陆银行。

日本人觊觎国宝

1937年卢沟桥事变,日寇全面侵华。叶恭绰避走香港,走前将毛公鼎从大陆银行取出,藏在上海的寓所懿园。由于叶恭绰用假名买的毛公鼎,日本人从银行无法查知它的下落。

孰料没多少日子,在香港的叶恭绰后院失火,他上海的姨太太潘氏,为争财产和家里人闹得不可开交,竟把毛公鼎就在叶家的消息插给了日本人。

日本人必将来叶家搜查。叶恭绰接到电报火速发电到昆明,让在西南联大当教授的侄子叶公超,连夜遁回上海,转移毛公鼎,无论如何不能落入日本人之手。

叶公超到上海刚把毛公鼎藏好,就被日本人抓起来了。一介书生被关押了39天,吃尽苦头,经7次提审,2次遭鞭挞、水刑,仍拼死保护国宝,誓不承认。

他得便秘密嘱咐家人,请铸工铸造一个古铜鼎冒名顶替。假鼎造出,上交日军,叶公超被释放。出狱后,他立即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,交给了叔叔叶恭绰。但不久香港也被日军攻占,叶又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送回上海。

抗战胜利前夕,叶恭绰回归上海,称病不出。叶家庞大家族,全仰仗他一人养活,困窘到了典当度日的境地,于是私下放出口风,转售毛公鼎。

时日军虽尽力不从心之态,上海巨商陈咏仁预感日军必败,来找叶恭绰,表示为留条后路计,愿买毛公鼎。原来,陈咏仁抗战期间,曾与日本军部合作,协助侵略

者收购过金属物资。他怕日寇投降后遭到国民政府清算,想到了买下宝鼎届时好为自己铺路。

叶恭绰约要陈咏仁写下保证:抗战胜利后,把鼎捐献国家。陈咏仁答应下来,写保证书后,掏了300两黄金。叶恭绰无奈之下,把毛公鼎转与陈咏仁。

从南京到台北

日寇投降,陈咏仁以电报和私信形式双发重庆蒋介石,私信抬头即称蒋校长,接下来表达了捐献国宝的意愿。

蒋介石批转教育部办理。时任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派教育部社教司司长、主管博物馆和图书馆工作的徐伯璞带两随从赴上海接收。

因战事阻道,徐伯璞一行先飞越南河内,再经海路前往上海,途中耽搁时日较久。没想到,他们人还没到上海,毛公鼎早被军统头子戴笠盯上,提早安排沈醉带人前往杜美路的陈宅,从陈咏仁手中劫收了。

徐伯璞持正式公文索要,军统拒绝交还。徐只得向杭立武复命,同时连续两次呈文蒋介石,报告毛公鼎被军统提前取走不还。老蒋大怒,急电戴笠,责令立即移交。戴笠这才不情愿地将到手的宝鼎吐了出来。而主动献宝的陈咏仁果然逃脱了国民党制裁。

1946年7月的一个深夜,徐伯璞一行坐火车从上海到达南京站。他将两个随从打发走,自己扛着装毛公鼎的箱子走进教育部自己的办公室,悄悄把箱子放在办公桌下,又在上面放了些书报,才迅速锁门离开。

人们不禁会问:堂堂一个教育部的司长,宝鼎又准备移交国家,为何还如此小心?原来,徐伯璞考虑,毛公鼎自出土以来,已成为多人都想攫取的对象。只能深夜运送,由自己单独存藏,他是怕万一被人知道,又会出什么幺蛾子。

徐伯璞是泰安人,在济南读的中学和大学。抗战爆发后,率山东青年学生入川,后就职教育部。1948年,国民政府要员向台湾撤退,杭立武派秘书送来一张飞机票,望徐伯璞一起撤退,遭其拒绝。新中国成立后,徐伯璞任江苏省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物组组长,还曾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顾问,2003年辞世,享年102岁。

毛公鼎在徐伯璞的办公桌下不为人知地躺了20多天后,1946年8月1日,中央博物院派专人前来教育部,将毛公鼎领走。

1948年10月,毛公鼎与存放在南京朝天宫的文物,包括散氏盘和司母戊鼎在内,公开进行了展出。

1965年,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,稀世瑰宝毛公鼎被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,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。台北故宫有从大陆运来的文物65万件,均定期轮换展出,而毛公鼎,被作为永不更换的展品。